

印象影响

江聲浩蕩
誥傳雷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柯灵 怀傅雷

杨绛 忆傅雷

叶永烈 傅雷之死

黄苗子 读《傅雷家书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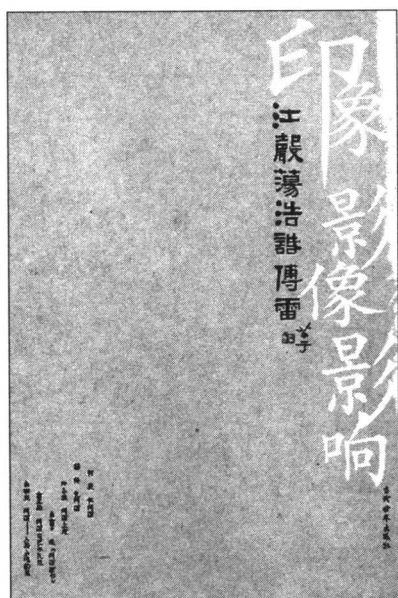
金圣华 傅雷与巴尔扎克

黄宗英 傅雷——人格永恒的美

金圣华 主编

江殷浩蕩諧傳雷

金圣华 主编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高玉琪

封面设计：蒋宏工作室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声浩荡话傅雷/金圣华主编. —北京：当代世界出版社，2006

ISBN 7-5090-0069-6

I. 江… II. 金… III. 傅雷 (1908~1966) — 人物研究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25368 号

出版发行：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(100860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
编务电话：(010) 83907528

发行电话：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(010) 83908408

(010) 83908409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才智印刷厂印刷

印 张：24

字 数：280 千字

版 次：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6 年 10 月第 1 次

书 号：ISBN 7-5090-0069-6/K·010

定 价：34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，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！

主编序言

窗外,近看一片绿荫,葱葱郁郁,吐露港躺在山下,从高处望,平静如镜。客寓山居,悄无人声,风雨过后的下午,天色仍暗,但出奇的宁谧,山峦层层叠叠,拔于海上,伸向远方。从窗口向外望,只觉海景山色,镶嵌在框架中,像一幅静态的画,只有用心瞧,才看到一叶孤舟,在微风中扬帆,缓缓移动,白帆映着浅灰的海面,若有似无……

都过去了,狂风暴雨的年代,骄阳肆虐的岁月;文革之初,傅雷夫妇深受冲击,因“士可杀,不可辱”,痛不欲生,以死抗争,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深夜悲愤去世。当年,不知多少人因傅雷的努力与奉献而在精神领域中拓宽视野,提高境界。如今,经过了整整四十个年头,物换星移,记忆淡化了,视线模糊了,读者是否还记得傅雷其人其事?译家的译德译品以及洋洋数百万言的译著,会否随着时光的流转,湮没在茫茫人海书中,恰似那渐行渐远的一抹孤帆?

有“翻译理论之父”之称的尤金·奈达博士于一九九五年访问香港中文大学,他在翻译系举办的讲座上,曾经表示任何一部译作,不论多么成功,其“寿命”也只能有五十年,过了此限,则应由全新的译本来取代了。我当时身为讲座主持人,曾经就这个问题跟奈达博士讨论。奈达是研究圣经翻译的学者,本身非常重视翻译,他之所以这么说,相信是从“翻译作为传达讯息的功能”这一角度为出发点,而圣经的讯息的确须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传达给会众,至于文本的文学色彩与价值,反而不是主要的考虑了。

我深信假如奈达博士精通中文并熟悉傅雷译作,他大概不会断言任何译作的寿命都不逾半百,因为傅雷弃世迄今,为时已久,他的译作仍在,影响仍在,他的全集年前出版,而风靡两岸三地的《傅雷家书》,其增补全新版亦刚刚面世,放在各大书店的显眼处;可是,另一方面,近年来也确有不少论者认为傅译不合潮流,应予取代,在此,我不禁要问,傅雷译作真的过时了吗?他的精湛译笔不再扣动人心了吗?

前不久,由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第三届“新纪元全球华文青

年文学奖”成绩揭晓，连串颁奖活动随之举行，五月的香江请来了宿著名家，也迎来了文坛新秀。这次比赛成绩特优，不但参赛人数破历届记录，小说、散文、文学翻译三组都人材辈出。其中散文组冠军由蒙古裔的鲍尔金娜夺得。鲍尔金娜的文章，深受诸位文学大家如余光中、林文月、董桥的赏识。她在一篇叙述得奖感言的文章《右手执笔，左手穿针》里，提到自己从小受身为作家的父亲影响，爱写作，喜读书。在她列出的书名中，赫然看到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一书在内，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，不知她看的到底是谁的译本？鲍尔金娜在港出席活动时，我因身为文学奖筹委会主席，忙于统筹一切，不及细问，日前以电邮相询，得到她的回应如下：“我看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是傅雷翻译的版本。不过说实话，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翻译这回事，就觉得每个字都是罗曼·罗兰写的……。我不懂翻译，但我觉得能让读者忘掉翻译这件事就是很强的功力吧。这本书的文字让我第一次见识到文学中的巨大激情，震动人心又不造作。第一次读的时候虽然很小，但还是一气呵成地读了下来，哭了好几次。后来又读过两遍，每一遍都引发新的思考。总而言之，我喜欢这本书。故事，语言，思想，都喜欢。”

鲍尔金娜二十出头，而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这初版于一九四一年，重译于一九五二年的译作，竟让年轻人自幼及长，捧读再三，并在心园中开出奇葩，自此不但热爱创作，且勇于进取，摘下全球文学奖桂冠，其中的奥妙与因缘，岂不令人寻思遐想，称奇不已？

不但如此，数十年来，多多少少成名的作家、译家、学者都在傅雷译品的滋养下，在文坛、译坛或学苑中，开创出一片新天地。多多少少的读者，受了傅雷刚正不阿、嫉恶如仇精神的感召，在为人处世的举措中，找到了方向。在傅雷逝世四十周年的今天，我们纪念他，不仅仅为了他在翻译或学术方面的超卓成就，更为了他崇高的译品译德，为了他对艺术、真理追求的执著与认真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高风亮节，以及视富贵如浮云，视名利为粪土的纯净本色。

一九九一年，我出任香港翻译学会会长之际，为了纪念傅雷逝世二十五周年，曾筹设“傅雷翻译基金”，并着手编纂《傅雷与他的世界》一书，于一九九四年正式出版。事隔多年，其间各方所撰有关傅雷的文章、论文、画传、传记或外传，纷纷面世，《傅雷家书》一版再版，各类《傅雷译文集》以及《傅雷全集》先后推出，证明这位译坛巨匠，在读者心目中，并没

有随着时间的久远而渐遭遗忘。

二〇〇六年初,分别接到傅敏及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编辑的来电及来函,邀我以《傅雷与他的世界》为基础,扩编一书,定于今年九月份出版,以纪念傅雷先生逝世四十周年,这就是本书的由来。

按出版社的意思,因傅雷逝世已久,年轻的读者恐对其印象模糊,本书原拟定名为《印象·傅雷》,但我总觉得这个书名太笼统,既不能涵盖巨匠一生波澜壮阔的艺术境界,亦无法描绘大师气势磅礴的精神领域。为了求得好书名,我向翻译名家罗新璋先生致电求教。罗不愧为傅译传人,他略一沉吟,就想到了个贴切的书名——《江声浩荡话傅雷》!

不错,“江声浩荡,自屋后上升”,这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译,就是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的起首语,一锤定音,“江声浩荡”几个字,把罗曼·罗兰原著中的气势、激情、诗魂、诗魄,全都带到读者的眼前,再随着译文的进展,流入心坎深处。是这几个字,点出了原著中不屈不挠的精神、恢宏包容的气度;是这几个字,描绘出译者通过原著而表现无遗的沸腾热血、爱国热情。傅雷当年翻译时,曾经在卷首语这样说:“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的艺术形式,据作者自称,不是小说,不是诗,而有如一条河。以广博浩瀚的境界,兼收并蓄的内容而论,它的确像长江大河,而且在象征近代的西方文化的意味上,尤其像那条横贯欧洲的莱茵河。”在译者心目中,这浩荡的江声,将东方与西方的文化贯穿起来,使作者与译者心灵相通,译者与读者精神相契。

本书共分“印象、影像、影响、附录”四辑。“印象、影像、影响”三词,取其音似声异,简洁明快,却能把傅雷的世界概括扼要地呈现出来。第一辑“印象”包括诸多名家如柯灵、楼适夷、杨绛、雷垣、刘抗、朔望等对故友的怀念,傅聪、傅敏昆仲对其先翁的追思,以及陈子善及叶永烈的文章。第二辑“影像”阐释傅雷各方面的贡献,涉及翻译成就、艺术哲学及音乐艺术观等。有关《家书》的文章,分别由楼适夷、黄苗子、叶永烈、林文月等执笔;有关《译文集》及《全集》的文章,则由罗新璋及我本人所撰;庞薰琹、林臻、金梅、罗新璋讨论傅雷的艺术境界;赵志钧、史易堂描述傅雷与黄宾虹的忘年之交;刘靖之研究傅雷的音乐观;至于傅雷与巴尔扎克的神交,傅译巴尔扎克的艺术及傅雷译品的精髓等,则由罗新璋及本人分别阐述。第三辑“影响”,除了萧芳芳一文之外,编收了不少全新的文章,包括黄宗英、王师北的散文,宋学智、许钧、萧红及本人的长篇论

文,张森根所撰的《傅敏与〈傅雷家书〉》与本人所撰的《赤子之心中国魂——我所认识的钢琴诗人傅聪》。这一辑之所以特别,是因为傅雷弃世已经四十载,他的人格美、翻译观,到底启发了多少人?什么人?他的译作译品到底如何影响了译途上的后进者?他的风骨与精神,对艺术的热爱,对真理的追求,为人处世的认真与执著,又如何体现在两位后人傅聪与傅敏身上?傅雷精神的当下意义又是什么?这一切的一切,都在各篇收编的文章中逐一剖析。第四辑“附录”列出《傅雷年谱》及《傅雷主要译著年表》,由傅敏及罗新璋重新修订,内容最为详尽完备,是研究傅雷的学者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。

本书封面黄苗子赐题,使全书生色不少,特此致谢,又承蒙傅敏提供大量图片、手稿,罗新璋建议书名,亦一并致谢。

超逾半个世纪之前,傅聪于一九五五年在波兰参赛时,傅雷曾经勉励儿子道:“音乐院长说你的演奏像流水、像河;……河,莱茵,江声浩荡……钟声复起,天已黎明……,中国正到了“复旦”的黎明时刻,但愿你做中国的——新中国的——钟声,响遍世界,响遍每个人的心!……名闻世界的扬子江与黄河,比莱茵的气势还要大呢!……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!……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!……有这种诗人灵魂的民族,应该有气吞斗牛的表现才对。”(《家书》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)不错,傅雷心中有一条河,不论是莱茵,是黄河,是长江,还是他生长之地黄浦江,这条河充满热情,洋溢诗意,澎湃汹涌,奔流不息,使艺术的气息弥漫两岸,把文化的种子布满四野。

《江声浩荡话傅雷》,唯有浩荡的江声,才能衬托出傅雷的胸襟、眼光、气魄与神采。谨以此书,献给弃世四十载的翻译大家傅雷及其可敬可佩的夫人朱梅馥。

金圣华

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八日

目 录

主编序言	金圣华(1)
印象	(1)
怀 傅 雷	柯 灵(2)
傅雷的性格	楼适夷(8)
忆 傅 雷	杨 绛(11)
怀念傅雷(怒安)同学	雷 垣(16)
傅雷·傅聪	刘 抗(20)
诸夏雷音 ——傅雷怒安先生辞世二十年祭	朔 望(31)
回忆我的爸爸傅雷	傅 敏(35)
傅雷先生的《法行通信》	陈子善(38)
父亲是我的一面镜子 ——傅聪心目中的傅雷	金圣华(42)
心如水晶一般透明 ——傅敏心目中的傅雷	金圣华(53)
傅雷之死	叶永烈(62)
影像	(93)
读家书,想傅雷	楼适夷(94)
读《傅雷家书》	黄苗子(100)
别具一格的家书 ——《傅雷家书》	叶永烈(107)
寂寞的背影 ——重读《傅雷家书》抒感	林文月(118)
从《家书》到《译文集》	
——傅雷夫妇逝世二十周年纪念	金圣华(124)
《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》与傅雷先生	庞薰琹(137)
《罗丹艺术论》读后记	罗新璋(142)
傅雷的艺术哲学	林 臻(145)

理想的艺术境界：“高远绝俗而不失人间性人情味”

——傅雷论艺札记之一	金 梅(154)
傅雷与黄宾虹	赵志钧(164)
惺惺相惜的傅雷与黄宾虹	史易堂(174)
傅雷的音乐艺术观	刘靖之(177)
读傅雷译品随感	罗新璋(193)
傅雷与巴尔扎克	金圣华(199)
傅译《高老头》的艺术	金圣华(209)
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的心路历程	金圣华(230)
妙笔传神 典范长存 ——《傅雷全集》序言	罗新璋(254)

影响 (263)

对我一生影响深远的傅雷伯伯	萧芳芳(264)
傅雷——人格永恒的美	黄宗英(267)
傅雷式批评	王师北(271)
谈傅雷精神的内涵及其当下意义	

——傅雷逝世四十周年纪念	宋学智 许 钧(274)
试论傅雷的翻译观	肖 红 许 钧(282)
从“傅译”到“译傅”	

——兼谈文学翻译中的“探骊”与“得珠”	金圣华(299)
赤子之心中国魂 ——我所认识的钢琴诗人傅聪	金圣华(319)
傅敏与《傅雷家书》	张森根(331)

附录 (343)

傅雷年谱	傅 敏 罗新璋(344)
傅雷主要译著年表	傅 敏(359)

印象

怀傅雷

柯 灵

当我们置身于天朗气清的世界，为祖国前途、个人命运额手称庆之际，很容易想起那些风雨如磐的日子，曾经同舟共难的朋友。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造成的大灾难中，无数人受尽残害，有的不幸丧失了宝贵的生命。几个月来，连续参加了好几位同志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，我除了深深祝愿死者安息以外，还另有一些亡友的影子常常萦绕心际，其中之一是傅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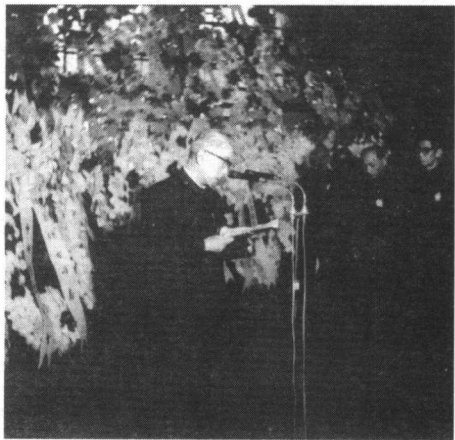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七八年春天，傅雷遗译巴尔扎克的《幻灭》出版了，接着又重印了《高老头》和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。这是无言的昭雪，为已逝者恢复名誉的又一方式。这些书问世时，书店门口出现了排队抢购的长龙，表明这位卓有贡献的翻译家一直活在读者心里，对一个作家来说，这是群众自发的最好的追悼仪式。《幻灭》等书出版后，傅敏从北京寄给了我，他的信里说：“如果父亲在世，他一定会亲自送给您的。现在却只好由我来代送了。想到这一点，我再也禁不住热泪盈眶。”到了我这样的年龄，泪泉已不是那么丰盈了，但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也禁不住老眼昏花，泫然欲涕。

傅雷以他勤奋的一生，从青年时代——三十年代初期开始，一共翻译了三十四部外国文艺名著。——主要是把法国的重要作家伏尔泰、巴尔扎克、梅里美、丹纳、罗曼·罗兰的重要作品介绍给了中国读者。其中有巴尔扎克的小说十五部，罗曼·罗兰的长篇小说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和关于米开朗琪罗、贝多芬、托尔斯泰的传记。希腊神话中说普罗米修斯向天上窃取火种，传给人世，因此触怒大神宙斯，身受严惩而坚强不屈。鲁迅先生以此为例，论证翻译工作的重要。他指的是在暗夜中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火种。这是第一位的工作。但向世界打开窗户，流通空气，扩大视野，以自救于窒息与孤陋，任何时候都不应低估其重大的意义。无产阶级文化必须注重借鉴与批判吸收，以壮大自己，这是毛泽东同志一再指明了的。近百年中，我们经历过两次“闭关锁国”的蒙昧时代：一次是清末，其目的在于延长僵尸的存在，使之免于早日风化；一次就是最近的十年，其目的在于使人民闭目塞听，便于他们摸黑篡党夺权。这种惊心

休目的教训,对我们是一面很好的镜子。

《幻灭》是傅雷最后一部译品。他着手翻译以前,曾要我帮他搜集一些旧上海小报界的行话和口语。读了《幻灭》,才清楚了解他当时的意图,因为《幻灭》中的部分情节,就是十九世纪巴黎小报界的花花絮絮。

傅雷译书的惯例,首先是再三精读原作,吃透原作的精神和全部细节。不理解的地方,查书,找内行研究,写信向国外专家求教。准备成熟,才开始落笔。初稿译成,至少再大改两次,然后誊清付排。亲自看校样,边校边改,直至清样,还有改动。译文要求做到既符合原著风格,又有精纯透明的民族气派。他曾说过:“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: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文字的,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。”这个话大概可以概括他对翻译工作的全部主张。细心的读者,都会在傅雷的译品中体味到他斑斑的心血,用不着我从旁喋喋。我这里想说的只是一句话:就傅雷工作的认真、严肃、负责这一点来说,真值得大家为他虔诚地唱一支赞歌。



傅雷夫妇平反昭雪追悼会——柯灵致悼词

者是精通中国文字的,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。”这个话大概可以概括他对翻译工作的全部主张。细心的读者,都会在傅雷的译品中体味到他斑斑的心血,用不着我从旁喋喋。我这里想说的只是一句话:就傅雷工作的认真、严肃、负责这一点来说,真值得大家为他虔诚地唱一支赞歌。

过分的认真,在傅雷的性格里构成一种强烈的色彩,那就是耿直。而因此带来的缺点则是执拗。长期的书斋生活又使他相当严重地脱离实际,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上的某些看法,自以为中正,其实却难免偏颇。他身材颇长,神情又很严肃,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,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。

作为可与倾谈的朋友,我和傅雷交游三十余年。但彼此的观点不尽一致,其间还曾发生过剧烈的争执。四十年代初,我和傅雷开始交往,冷不防就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。那时我们祖国正处于艰苦的抗战年代,上海已经沦陷,用傅雷的话说,那是“一个低气压的时代,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”。他化名迅雨,给《万象》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,评介张爱玲的小说。其时张爱玲在文坛上初露头角,傅雷大力揄扬,也严格

指责了她的缺点。文中有一段话,涉及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。傅雷在法国专攻的学科之一是艺术批评,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,并评骘“五四”以来文风的得失。这类问题,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己见,相互切磋。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,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,而我又一向主张,在沦陷区的刊物上,为避免敌伪利用,不宜随便议论身处前线的战友,哪怕这种议论无伤大雅也罢。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名,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,发表时把这一段文字删掉了。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,提出要我在报刊上更正,向他公开道歉。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,也就取得了谅解。我后来发现,他尽管很固执,但骨子里是通情达理的。与人交,如果感到气味不投,绝不稍假词色,否则就总是以宽厚待人,既坚持原则,又十分旷达。五十年代中期,由于对某些问题看法有分歧,我和他两次当面争论,争得不可开交,以致他的夫人梅馥在旁边坐立不安。但争论是从善意出发的,不含有任何渣滓,因此不但没有产生隔阂,反而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。因为直来直往的争执正是推心置腹的表现,而虚与委蛇必然成为友谊的障碍。傅雷对中西文学、音乐、美术都有很深的素养,我,对他的学问和为人怀有真诚的钦佩。但现在分析,我当时对他一定有些潜在的政治优越感,否则完全可以用心平气和来代替面红耳赤,何况他当时正处在拂逆的困境。进一步看,我的观点基本上也是书生之见,并不比他更切合实际一些。每想到这一点,我就感到由衷的悔愧,遗憾的是我再也无法向他谢罪了。

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,昆明发生了镇压民主运动的大血案。但在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下,全国人民都处在迷离惆怅的状态中。《周报》发表了“昆明血案实录”,才把黑暗的帷幕揭开。“实录”叙述了事件发生的经过,刊载了昆明全市大中学校罢课委员会的全部油印宣言,教授们的呼吁书,还发表了殉难者的照片,题为《血的控诉》。封锁线突破了,这期《周报》激起社会强烈的反应,连续再版了两次。而这场战斗的弹药,就是傅雷提供的。他正巧有朋友从昆明坐飞机到上海,带来了这些材料,立即全部交给了《周报》。对“一二·一”惨案的抗议,轰轰烈烈,很快形成了民主斗争的高潮。

一九四九年以后,傅雷照旧闭门译书,足不出户。党出于对他的爱护,动员他走出书斋,接触一下生活,安排他参加了一些宣传部门的全国

性重要会议，还选他当了上海市政协委员。他一面埋怨浪费了时间，耽误了工作，一面还是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。他的眼睛一向在云端里，对许多事情要求严格，心直口快，勇于提意见，而这些意见，当然难免瑕瑜互见。在“反右斗争”的风暴中，他被卷进去了。他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写了大量的笔记，严肃地，而且带有痛苦的心情检查自己的问题。但是几次检查都没有通过。他思想不通，对有些过火的批判非常反感。于是他向领导声称：如果他有罪行，愿意接受惩处，但以后不再出席会议了。这就把事情弄成了一锅夹生饭。这是一九五七年夏季的事，他不了解，党仍然是爱护他的。到了一九五八年春天，我正在西湖改编夏衍同志原著的《秋瑾传》电影剧本。一位在上海主管文艺的同志把我招回上海，给了我一个任务：以朋友身份劝说傅雷，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，实事求是地作一次自我批评，以结束这一重公案。我好不容易说动了傅雷，并对他的书面检查提了意见，然后再度去了杭州。不久接到傅雷一封短信，说开会的结果，他被戴上了“右派”帽子。他强作达观，说处在这样的大风浪中，牺牲区区一个傅雷，算不了什么。我像猛然坠入冰窖，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心。特别使我难受的是，好像我有意把他诱进了陷阱。我在僻静的净寺一带踱了大半天，想来想去，想不透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大转折。因为从那位同志的谈话中，市委宣传部的意思很清楚，他们并不认为傅雷是右



傅雷夫妇在天台山（一九五三年四月）

派，所以决心要把他保护过关。傅雷嫉恶如仇，热爱光明，热爱祖国，解放后是跟着党走的，熟悉他的人都看得见他的进步。我坚信党的英明，迟早会了解他。我当晚在灯下写了简短的复信，把我的信心告诉了他。

我回到上海，找到那位同志，探听对傅雷问题的处理，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。那位同志向来作风明快，此时却沉吟半晌，只说他也没有料到是这么个结果。我意识到他本人大概碰上了一些麻烦，不好多问。这很像是个谜，现在这个谜底揭晓了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上海并不

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一觉醒来,突然成为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的基地的。张春桥的鹅毛扇子,早就在上海摇动。据现在揭露出来的材料,张春桥的反革命历史,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。但是他受着上峰的保护,稳如泰山。“牺牲区区一个傅雷”的确不过是“牛刀小试”而已。那时上海文艺界出现许多怪现象,现在看来,决不是偶然的。

傅雷又回到了书斋,杜门谢客,但还是勤勤恳恳,一心一意译他的巴尔扎克。唯一的消遣是在小园子里种花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继续印行他翻译的书,但建议他另用一个笔名。他的回答是“不”——要嘛还是署名傅雷,要嘛不印他的译本。出版社顺从了他。

一九六一年,党给傅雷摘掉了右派帽子。事前有关部门把这个喜讯告诉他,并希望他有个认识错误的表态。他的回答还是“不”,宁可戴着右派帽子也罢。后来接受了再三的劝告,才实事求是地表示了态。

傅雷回到他自己的天地以后,不再在社会上露面了。一度的活跃,成了他一生中绚烂的片段。心上的暗影抹掉了,他工作得加倍的勤奋,从一九五八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夕,译了丹纳的《艺术哲学》,巴尔扎克的《赛查·皮罗多盛衰记》、《搅水女人》、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、《比哀兰德》、《幻灭》,重新修改了《高老头》。这一张书单就证明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这把火一点燃,一切妖魔鬼怪就在刺眼的光影掩护下开始阴谋活动。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黄昏,我被投进了监狱。当我被送进一间屋子以后,就听见背后关门上锁,传来刺耳的铁器撞击声,我的心立刻紧缩起来。一个人只要听过这种声音,终生就再也不会忘记。

大约过了两个月,我在狱中读报,有一条消息说:上海江苏路地段“运动搞得很出色”。这种特定的语言表示,那里的过火行为特别突出。而傅雷正住在那个地区。我忧心忡忡,不知道像他这样的性格,怎么应付得了这种出乎常情的局面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种担心是白费了,因为那时他已经不在人世。凑巧得很,他的去世就在九月三日,我开始坐牢那一天。我那时虽然被这突然袭击弄得晕头转向,但平生不作亏心事,上床后照常进入了睡乡。那一年的秋天似乎特别来得早,监狱又在郊区,到半夜里,我感到一阵凛冽,一时冷醒了。傅雷夫妇双双含冤辞世,正是这个时刻。

倒行逆施决没有好的下场,归根到底,历史是要前进的。党和人民

付出了惨重的代价,却换来了清明稳定,带来了美好的希望,现代化远景已经遥遥可见。党历来重视的知识分子政策,经过肆意践踏之后,重新正常运转。像傅雷这样踏踏实实、刻苦耐劳、卓有成就的文艺家,正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财富。今天也是知识分子大有作为的时候。傅雷没有等到这一天,为公为私,都是莫大的遗憾。

也许会有人觉得,傅雷太桀骜不驯了。但这种桀骜不驯,是对事而不是对党,我们应该把这个界限划清楚。党对原则界限从来是不含糊的。照我想来,党宁取光明磊落的鲁男子,也不要看风使舵的聪明汉,半阴半阳的两面人。

永别了,傅雷同志。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,愿你们夫妇在地下安息!

一九七八年九月

原载香港《新晚报》,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五日。后改写,收编于叶永烈:《傅雷一家》,天津人民出版社,一九八六年。本书转载时略有删节。

傅雷的性格

楼适夷

傅雷的性格，确实是很孤傲的。我是在敌伪统治、百鬼夜行时期的上海，初次认识傅雷的。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，对汉奸卖国贼，他表示了凛然不屈的极端的孤傲，甚至不让已到学龄的孩子进当时的小学，宁肯由自己和夫人当孩子的家庭教师。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，他又是一位民主主义者。当抗战胜利，国民党统治者从峨嵋山下来，傅雷对他们依然表示了不屈的孤傲。他宁肯变卖遗产过活，也拒绝作任何的合作。

解放战争深入以后，我离开上海，和傅雷疏远了。我非常悬念这位孤傲的友人，不知他怎么样了。全国解放后，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，我接到他从上海寄来重译新版、印得很讲究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我知道他又认真地工作起来了。

以后每次有机会去上海，我一定去看看他。首次探访时，我发现他把自己的门还关得很紧，不爱参加外间的活动。他表示他将从此闭门不出，埋头从事他所热爱的巴尔扎克的翻译，作为他对国家、社会尽力的事业了。其实他还是很关心国事的，有不少已担负了新职务的旧知识分子，他过去的朋友，都爱找他来发牢骚。他听到的尽是一些所谓新社会的阴暗面。他一见到我，就把这些材料倾盆大雨似的向我泼来。我听他谈这些话，跟过去同我谈旧社会时根本不同，以前他表现出仇恨和愤怒，这回所表现的却是焦急和不安。我从这儿对他怀着信心，希望他把门窗打开点，让新鲜空气流进他的屋子来。

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去探望他，我发现他的精神在一次比一次地昂扬起来。他依然埋头在自己的书斋里，但发现自己所做的工作，已受到旧时代从未受到过的重视。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政策，使他的政治热情越来越高，他的大门已为许多新朋友打开。一九五四年，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，邀请他参加，他放不下手里的工作，没有出席，却写了一篇数万言的书面意见。到现在看来，他的意见仍旧是我们应努力的目标。

一九五七年春天，党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，他被邀来京出席。